

· 专题: 妇女与环境 ·

村庄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初探^①

刘 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自 2018 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来, 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问题变得愈发重要。在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政策推动下, 东部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乡/镇转运、县/市处理”的模式逐步确定, 形成了农村保洁员这一劳动群体。关注农村环卫保洁工作的性别化问题, 特别是女性参与村庄日常保洁和垃圾收集工作的实践与挑战, 有助于推动实现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以华北平原一个实行“垃圾上门收集模式”的乡镇为例, 在环卫设备机械化转型的背景下, 分析农村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的表现与后果, 说明老年女性保洁员如何平衡家庭、工作与公共事务参与之间的关系, 为进一步维护农村环卫与保洁人员权益、促进妇女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人居环境; 生活垃圾治理; 性别化分工; 保洁员; 农村妇女

[中图分类号] C912.82; C91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24)05-0009-12

一、引言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 也打响了乡村振兴的第一枪。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要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指出,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 事关农民群众健康, 事关美丽中国建设。

生活垃圾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政策引领下, 东部地区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逐步形成了“户集、村收、乡/镇转运、县/市处理”模式。这种模式通常需要政府和村集体出资聘请物业公司服务, 由此催生出农村保洁员这一新型职业身份^②。农村保洁员由村/镇统一公开招聘, 划片负责村庄范围内的清扫保洁、垃圾转运、绿化维护等工作, 接受村委会和物业公司的指导和监督。与城市环卫保洁工人一样, 这个群体通常被其他人称为“收垃圾的”或“扫大街的”。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乡村生活垃圾治理中的女性角色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2023M733863); 息壤学者支持计划“女性视角下的乡村农户废弃物实践”(项目编号: XR2023-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公众生成的数据与环境政策分析能力: 驱动机制及其效应”(项目编号: 72274162)

[作者简介] 刘齐,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

① 研究发现曾在“息壤学者支持计划”第二期结项交流会上汇报, 感谢王晓毅、张劭颖等专家和息壤伙伴的评议与启发。文章初稿曾在美利坚大学肖晨阳教授组织的环境社会学研究青年工作坊汇报, 感谢与会同伴的批评建议。

② 孙旭友:《垃圾上移: 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及其非预期后果——基于山东省 P 县的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1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将环境卫生服务人员定义为“从事公共区域保洁,生活垃圾清运、处理和相关作业的人员”。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2022年全国约有环卫工人200多万人^①,这一数字远远低于维持现有环境卫生服务所需的环卫工人数量^②,环卫工人普遍面临着收入低、工作量大、工作环境恶劣、社会地位低下等现实问题。作为环卫和保洁领域主要从业者的女性通常还具有来自农村、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偏低等特征^③。《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指出,女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如何增进包括女性村庄保洁员在内的环境卫生服务人员的工作权益和个人福祉,不仅关乎女性参与环境与公共事务的需求、机会和能力,而且有助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本文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的女性参与问题。通过在华北平原风华镇^④开展的为期三周的田野调查发现,城乡环卫一体化制度下的农村环卫保洁工作具有自我污名化特征,且存在基于环卫设备使用的职业性别隔离问题,具体表现为“男性开电动车收垃圾,女性骑三轮车扫大街”。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在劳动报酬、支配关系和劳动可见性等三个方面将乡村女性保洁员置于次级地位。另外,乡村妇女通过从事村庄保洁工作能够获得归属感和情感支持,这既是老年女性村民参与村庄人居环境常态化管护的一种方式,也有利于打破老龄化背景下乡村生活的“原子化”趋势,推动构建文明、和谐、友善的乡村社会关系,激发乡村生活的生机与活力。这些发现揭示了农村保洁员的职业与劳动境况面临的性别与年龄的交叉歧视^⑤,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女性从事村庄环卫保洁工作的困境与动力,从而回应近年来学界对于如何支持村民和妇女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环境治理的探讨^⑥,对进一步培育农村妇女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机会与能力也具有政策意义。

本文将从职业性别隔离和职业污名化的视角入手,梳理劳动分工与劳动过程的性别化问题,揭示在卫生与废弃物管理领域工作的女性面临的多重困境。以华北平原一个正在实施生活垃圾上门收集的镇为案例,呈现垃圾上门收集过程中村庄环卫保洁员群体的劳动与互动过程,剖析村庄环卫保洁工作性别化的表现与结果,探究女性村庄保洁员如何平衡家庭、工作与公共事务参与之间的关系,并为维护乡村环卫保洁工作人员权益、促进妇女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 职业性别隔离:表现与成因

职业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sex)是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重要问

^①中国政府网:《全国环卫工人数量达200多万名 各地持续推进改善待遇维护权益》,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7/content_5721839.htm, 2024.05.02.

^②根据2019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提供的道路面积、清扫保洁面积、生活垃圾清运量等数据推测,全国共需要450万环卫工人,在现有作业模式下,这一数字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进一步攀升(数据来源:2021年5月盈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2020年环卫工人收入现状及环卫装备替代人工发展潜力白皮书》)。

^③参见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上海:光启书局,2023年版。

^④按照研究伦理与写作规范,本文中提到的镇/村/企/人名均为化名。

^⑤杜鹏,李子洋:《打破“共谋沉默”:老年妇女的韧性、贡献与赋权》,《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⑥戚晓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的女性参与》,《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题^①,其指的是以性别为依据的工作与职业分配,体现出“性别化的劳动分工”(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ur),是工作场所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来源^②。职业性别隔离的表现方式有两种:以性别划分职业类型的水平隔离与以性别划分职位高低的垂直隔离^③。职业性别隔离揭示出从业资格、工作条件、晋升机会、薪资待遇和技能培训等劳动力市场的各个方面隐含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总的来说,女性通常处于低收入、低地位、辅助性和服从性的领域,而男性则更有可能占据高收入、高地位、具有引领和决策权力的位置。

职业性别隔离与性别刻板印象、社会规范、社会歧视以及教育和培训机会等结构性因素相关^④。这些相互联系的因素限制了女性进入某些行业/职业领域或获得晋升的可能,助长了关于某些工作更适合男性或女性的观念,也贬低了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工作的价值。此外,将家庭与工作两个领域内的性别化劳动分工结合起来分析更有助于理解职业性别隔离的社会成因^⑤。对于女性家庭角色的社会期待以及与之相关的性别化的家庭劳动分工迫使女性承担更多照护与养育的家庭劳动,从而更容易陷入家庭职责与工作职责、母职期望(作为一种惩罚式的“必须性期待”^⑥)与自我实现的两难处境。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职业女性通常很难协调上述冲突,不得不逐渐退出职场晋升竞争,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于女性难以承担关键工作职责的刻板印象。

技术进步使得职业性别隔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正如英国社会学家 Judy Wajcman 所指出的,技术并非性别中立的(gender-neutral),技术的发明、推广、应用和更新都体现出技术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同时也被二者塑造^⑦。综合既有研究,技术与劳动分工性别化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不论事实是否如此,由女性主导的工作通常被认为在技术含量和重要性上次于由男性主导的工作,这种观念同样是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的产物^⑧。在工作中理解、掌握并运用一些技术被认为是更有男性气质的表现^⑨。反过来说,在这种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女性可能会主动或被动地减少使用这些技术的可能。其次,技术的出现可能会改变甚至替代一些专业领域中由女性承担的工作,从而加剧性别刻板印象。通过研究宋、明、清时期的丝织业变革历史,白馥兰(Francesca Bray)清晰地勾勒出丝织生产工业化前后,女性如何从发明者或管理者逐步沦为辅助性工人,从而在纺织领域被迫边缘化这一历史过程^⑩。最后,虽然技术进步可能增加女性进入那些传

①ANKER R.,“Theories of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by Sex: An Overview”, in *Women, Gender and Work: What is Equality and How do We Get There?*, Loutfi M.F.(ed.),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1, pp.129-155.

②SILTANEN J., *Locating Gender: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Wages and Domestic Responsibil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4.

③RESKIN B. F., ROOS P. A., *Job Queues, Gender Queues: Explaining Women's Inroads into Male Occupati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ENGLAND P., BUDIG M.J., FOLBRE N., Wages of Virtue: The Relative Pay of Care Work, *Social Problems*, Vol.49, No.4, 2002, pp.455-473; RIDGEWAY C.L., *Framed by Gender: How Gender Inequality Persis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⑤杨菊华:《边界与跨界: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的变革》,《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⑥杨菊华:《边界与跨界: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的变革》,《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⑦WAJCMAN J., Feminist Theories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4, No.1, 2010, pp.143-152.

⑧ENGLAND P., BUDIG M.J., FOLBRE N., Wages of Virtue: The Relative Pay of Care Work, *Social Problems*, Vol.49, No.4, 2002, pp.455-473.

⑨WAJCMAN J., Feminist Theories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4, No.1, 2010, pp.143-152.

⑩[美]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统意义上由男性主导的行业的概率,但劳动力市场准入平等并不等于职业性别平等,由男性主导的行业和组织要求女性必须适应男性的工作理想和标准才能确立自己的专业地位^①。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数理和工程领域(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简称 STEM),即使女性为职业生涯以及处理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作出了诸多努力,工作组织中的制度设计和性别角色期待依然会排斥女性的职业身份。性别化的等级分工与女性不适合技术型岗位的偏见形成了“循环论证”^②。

(二)“脏活”与职业性别隔离

本文关注的环卫保洁工作是传统意义上的“脏活”(dirty work),即在身体、道德和社交层面具有不被社会认可的“污点”^③。“脏活”带来的职业污名多见于体力劳动和服务行业从业者,比如清洁工(身体接触垃圾、粪便等“脏”东西)、性工作者(常常受到道德谴责)以及屠宰厂劳工(既包括与血液、尸体等禁忌之物的身体接触,又涉及动物伦理等道德问题)等。由此可见,“脏活”之“脏”不仅仅指涉劳动对象与劳动环境的物理属性,更重要的是社会规范与价值判断上的“不道德”、“不光彩”或“不体面”^④。

美国社会学家埃亚勒·普雷斯(Eyal Press)在其最新著作中进一步拓展了“脏活”的社会内涵与道德负担。他指出,“脏活”具有的最重要的一项特征是“好人”(即社会中的体面人)的默示授权。“(好人)认为这类工作对社会秩序不可或缺,但并不明确表示同意,如果有必要还会将相关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授权乃基于这样一项了解,即其他人会处理日常的苦差事”^⑤。换句话说,什么是“脏活”、谁来从事“脏活”以及“脏活”为何有损声誉,这些问题的出现总是建立在社会关系不平等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占据更多资源的群体更有可能免于从事“脏活”,从而免受职业污名的困扰。另一方面,针对“脏活”的污名、歧视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伤害正是源于这些特权阶层的无视、默许和回避。

许多“脏活”都具有职业性别隔离的特征,特别是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脏活”行业通常从生理和心理两个维度对女性产生排斥。虽然没有单独探讨,但普雷斯书中描绘了在男性主导行业工作的女性(比如在监狱工作的女性心理咨询师和屠宰场流水线上的女工)所承受的职业污名、暴力威胁、风险暴露与性骚扰等多重负担及其导致的羞耻、自责与恐惧等负面情绪^⑥。以尼泊尔的建筑女工为例,Kalpna Wilson 等人探讨了非正规、不稳定工作中与性别相关的工资不平等、工作基础设施不足、性骚扰等问题,以及女性为争取同工同酬、性别平权和改变家庭性别观念开展的多项抗争策略^⑦。着眼于我国公路货运业,马丹分析了“跟车卡嫂”(即与丈夫共同跑车经营货运的妻子)进入传统男性蓝领职业后如何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改变原有的性别认知与性别观念^⑧。这些研究鲜明

①HEIMANN S., JOHANSSON K., Gendered Work in Geoscience: Hard Work in a Masculine Field,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Vol.31, No.1, 2024, pp.16-35.

②李海天:《程序员工作的性别化——以中国信息技术产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3期。

③HUGHES E.C., Good People and Dirty Work, *Social Problems*, Vol.10, No.1, 1962, pp.3-11.

④DOUGLAS M.,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New York: Routledge, 1966.

⑤[美]埃亚勒·普雷斯:《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李立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3页。

⑥[美]埃亚勒·普雷斯:《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

⑦WILSON K., ISMAIL F., KHAREL S., et al., Women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Nepal: Collectivities under Precarious Conditions,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Vol.31, No.2, 2024, pp.419-434.

⑧马丹:《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逻辑——以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为例》,《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3期。

地展现了作为职业性别少数的女性所面临的职业污名和职业性别隔离问题,也揭示了双重压力下女性反思、挣扎与博弈的过程。缓慢、日常、零碎的劳动实践成为女性挑战甚至破除传统性别分工限制的关键过程^①。

本文关注卫生与废弃物管理领域的职业性别隔离问题。现有研究指出,废弃物管理领域存在基于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劳动分工,其中女性大多集中在垃圾收集、清扫和分类等低收入、高风险的劳动领域^②。在我国,与白领职业领域相比,蓝领和半蓝领的职业性别隔离仍在持续^③。女性与外来务工者身份的叠加使得垃圾清洁工遭受双重污名,特别是垃圾分类运动开展后,环卫工人时常承受垃圾混合收运的指责^④。在城市中从事垃圾相关工作的农村女性不仅要承受职业污名,还要面对与之相关的抚养、照护与教育问题,比如难以为孩子提供卫生的生活环境,难以减少职业污名给孩子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被迫与孩子分离^⑤。

在以上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环卫工作的性别化问题。透过职业性别隔离的视角,本文提出以下问题:谁参与了农村环卫保洁工作?农村日常保洁是否存在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清扫和运输设备机械化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村庄女性保洁员的劳动角色、工作能力和劳动实践?她们又是如何理解与应对从事这项职业的潜在风险或困难的?

三、案例选择和研究方法

风华镇地处鲁中丘陵的北部边缘,现辖 56 个行政村,辖区面积 74 平方千米,总人口 5.4 万人,是山东省淄博市首个实施农村生活垃圾上门收集的乡镇。作为全国重点镇和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风华镇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有很大的张力。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凭借矿产资源优势,风华镇逐步形成了采矿、冶铁、炼钢、燃料、热电、化工、管件加工、医药玻璃、生物制药、造纸等多业并举的工业体系。2006 年起,镇财政收入连续 5 年位居全区首位。2013 年以来,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风华镇的财政收入增幅逐渐放缓。2021 年全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68.87 亿元,财政收入 5.58 亿元。

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地方收入,也导致了生活垃圾的急剧增加与环境污染的加重。2014 年,山东省开始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要求采取环卫市场化运作模式,推动城乡生活垃圾“统一收集、统一清运、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风华镇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逐渐从过去的随地乱丢,转变为经由垃圾桶收集后统一处理。2020 年起,为了配合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风华镇开始采取上门收集后分类处理的垃圾治理方式。这种垃圾治理方式为我们理解村庄保洁员这一劳动群体的产生与劳动过程提供了具体情境。

具体来说,风华镇以“垃圾上门收集、全域消灭垃圾桶、实施垃圾分类”为整治目标,以“垃圾日产日清、机械化扫保、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为总思路。在环卫市场化方面,将城乡环卫一体化

①马丹:《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逻辑——以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为例》,《社会学研究》,2022 年第 3 期。

②更多数据参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Gender and Waste Management*, <https://www.unep.org/ietc/what-we-do/gender-and-waste-management>, 2024.07.01.

③李春玲:《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变化趋势》,《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④张劫颖,蒋培:《垃圾分类项目中的关键行动者——一个关于清洁工人的民族志》,《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

⑤胡嘉明,张劫颖:《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版。

工作和绿化管理工作整体打包,以 750 万元/年的价格承包给润田环卫公司。在设施与人员配置方面,镇政府投资 110 余万元,采购了 52 辆垃圾收集电动车,按照村民人数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的比例配置村级保洁环卫人员,负责村庄内部的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和绿化等工作,并要求环卫保洁人员的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由镇政府按照 9000 元/年的标准发放工资,以期实现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在垃圾分类方面,镇政府将农村垃圾细分为六类,分别为生活垃圾、可回收垃圾、农业生产垃圾、柴草和餐厨垃圾、有害垃圾以及建筑垃圾。针对每种垃圾类型,采取不同的收集和处理方式。其中,垃圾小车上门收集的主要为生活垃圾、柴草和餐厨垃圾以及有害垃圾等三类。

2023 年 5 月,本研究课题组前往风华镇所在的市辖区进行预调研,通过与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分类相关企业(生物堆肥、生物质燃料)以及乡镇、街道干部进行访谈,初步了解该市辖区内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及处理等相关工作的总体情况和示范点建设。9 月,课题组在风华镇开展为期两周的正式调研,经镇政府介绍选取了 9 个尽可能涵盖不同人口规模、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的案例村庄,开展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在其中的 7 个村庄中,笔者参与了垃圾上门收集工作,每日工作时长约为 60 至 180 分钟,将劳动过程以图片、视频和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最终形成了 1.3 万字的《风华镇劳动日记》。劳动之余,笔者与垃圾收集员、村庄保洁员、村干部、村民等进行了一对一访谈或焦点小组访谈,围绕该村垃圾收集与处理的历史与现实、个人的乡村环境治理参与等方面展开讨论。除了乡村调研,访谈对象还包括污水处理厂、人畜粪便处理企业、环卫公司、区市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每个人的访谈时长为 60~90 分钟。调研共收集访谈记录 40 份,包括 8 位垃圾收集员(均为男性)与 10 位保洁员(均为女性)。这些劳动者的平均年龄为 68 岁,从事本村保洁环卫工作的时间在 1 年至 4 年之间不等,每日早间最早工作时间为凌晨 2:30,最晚不超过早上 8:30,具体信息如表 1。

表 1 受访保洁员基本信息(N=18)

受访者	村庄	年龄	性别	家庭状况	参加保洁工作年份	每日保洁工作时段 ^①	月薪(元)
苏大爷	大成	69	男	与老伴同住,老伴是村庄保洁员	2021 年	5:30-6:30	2500
李阿姨	东成	70	女	不明	2020 年	6:30-8:00	600
赵阿姨	东成	70	女	独居,有两个儿子	2020 年	6:30-8:00	600
王阿姨	东成	65	女	与未婚的儿子同住	2020 年	6:30-8:00	600
路大爷	东成	81	男	不明	2020 年	7:00-8:00	1800
隋阿姨	西成	70	女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五口同住	2021 年	4:30-6:30	600
王大爷	西成	67	男	独居	2021 年	5:30-7:00	1200
吴阿姨	南成	68	女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四口同住,老伴是本村的垃圾收集员	2019 年	6:30-7:30 16:30-17:30	800
宋阿姨	南成	73	女	独居	2019 年	6:30-7:30 16:30-17:30	800
林阿姨	南成	70	女	不明	2021 年	6:30-7:30 16:30-17:30	800
于大爷	小成	71	男	独居	2021 年	6:15-7:30	1000
孙阿姨	北成	63	女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四口同住	2020 年	5:30-7:30	1000

^①此处为夏季(5月至10月)工作时段。一般情况下,冬季(11月至次年4月)的工作时段会推迟到日出之后,大约在 7:00-7:30 之间。

续表

受访者	村庄	年龄	性别	家庭状况	参加保洁 工作年份	每日保洁 工作时段	月薪 (元)
卢阿姨	北成	70	女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三口同住	2020年	5:30-7:30	1000
韩大爷	北成	66	男	与老伴同住,老伴是村庄保洁员	2020年	5:30-7:30	1000
周大爷	北成	75	男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四口同住	2020年	5:30-7:30	1000
邹大哥	中成	53	男	与妻子共同承担本村垃圾收集工作	2020年	6:00-8:30	1200
牛阿姨	行村	61	女	与老伴和儿子一家四口同住	2022年	2:30-4:30	1330
何大爷	行村	68	男	独居	2020年	3:30-5:00	1330

四、研究发现

垃圾车的起点是苏大爷的家,在富民大街的南端。因为挨着村委会,周围的几户门前都没有垃圾。到了大街中段,一户大门前摆放了三个垃圾袋。里面是果皮、菜叶之类的,似乎被猫狗扒过,有垃圾散落在地上。苏大爷拎起垃圾袋就扔到车厢里,对地上散落的垃圾毫不在意。因为那些垃圾很快就会被包括他的老伴在内的三个保洁员用扫把清理干净。村妇女主任称她们是“三个娘们”。

《风华镇劳动日记》2023年9月5日

上述文本记录了笔者第一天参与村庄垃圾收集的劳动场景。不难看出,大成村的日常保洁工作分为两个部分:(1)由男性保洁员驾驶垃圾小车收集垃圾;(2)由女性保洁员骑着人力三轮车扫街道。事实上,在田野调查的9个村庄中,“收垃圾的”几乎都是男性保洁员,女性保洁员则是“扫大街”队伍的主力军。镇政府的数据显示,2023年风华镇共有村庄保洁员295人,其中女性155人,男性140人,男性群体中有56名垃圾小车驾驶员。在经验观察和基本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将分析村庄环卫保洁工作的劳动参与、劳动分工和劳动体验,理解机械化设备使用与性别化劳动分工的关系与后果,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的常态化管护提供一个具有性别敏感性的新视角。

(一)“好人谁干这个?”:村庄环卫保洁工作的自我污名与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虽然环卫保洁工作对于农村人居环境的常态化管护十分必要,乡村垃圾收集员和保洁员却习惯性地对自己的职业身份进行自我贬损。对于专事“脏活”的工人来说,工作带来的道德负担和情感困境包括被污名化、自责、丢失颜面和自尊受损等^①,大多数受访对象都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在劳动过程中,小成村垃圾收集员于大爷曾自嘲道:“好人谁干这个?”北成村孙阿姨在劳动后的访谈中袒露:“收拾垃圾是最底层的活,我一直干,也习惯了……”。这些说法反映了村庄环卫保洁工作从业者的污名内化倾向。

“污名内化”指被污名者认同自身或群体被施加的污名并形成稳定的自我污名,无力应对是从业者选择污名内化的原因之一^②。根据受访者自述,我们归纳出导致污名内化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难以清除身体上的生活垃圾的气味,“干一早上,身上就有味,干这个活干净不了”(孙阿

^①[美]埃亚勒·普雷斯:《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

^②ASHFORTH B.E., KREINER G.E., CLARK M.A., et al., Normalizing Dirty Work: Managerial Tactics for Countering Occupational Tai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50, No.1, 2007, pp.149-174.

姨)。在夏季,垃圾的臭味萦绕在车厢内挥之不去,不仅难闻,而且会沾染衣物(周大爷)。由于担心身体散发臭味,许多保洁员选择在工作时固定穿一套衣服,但是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叠让他们无法真正消除垃圾的臭味对他人的影响。二是难以避免与垃圾接触而留下污垢,“垃圾很脏,但是你要使(用)手(拿垃圾)……最脏的活,工资还最低”(邹大哥)。“我戴着两层手套,手上都有油,干净不了”(卢阿姨)。身体和衣服上留下的污垢如若未及时清洗,就会伴随着保洁员的移动而移动,可能在村庄的社交、办公等公共场所留下印迹,成为他人背后议论的对象。

导致上述两个因素的直接原因是劳动设备简陋和缺乏劳动保护。不论是狭小且缺乏保温措施的垃圾小车,还是“小车对大车”的垃圾转运方式,无一不将保洁员暴露在一个更容易被污垢和臭味沾染,也更缺乏尊严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之中(见图1)。在财政收入减少和环保要求增加的双重约束下,不少乡镇垃圾转运站无法实现压缩设备的绿色升级,转而通过各村垃圾小车对接环卫公司的垃圾压缩清运车的方式,将村庄生活垃圾转运到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而这个权宜之计可能进一步增加了村庄保洁员的劳动强度和 environment 风险暴露。



图1 垃圾小车驾驶室(左)和垃圾转运站(右)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污名内化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村庄保洁员有限(乃至几乎没有)的选择空间与议价能力。同样由于乡镇财政紧张,自2022年起,村庄保洁员的工资暂时由村集体部分垫付,这将那些村集体并不宽裕的村庄保洁员置于收入不确定的风险之中。当被问到为什么在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还坚持做这份工作,许多保洁员表示受到年龄和身体限制,很难再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不做这个,那就一点都挣不了”(王大爷)。“以前在工地(干活),砸伤了脚,走路不方便,人家都不用我了”(韩大爷)。这些“留守老人”虽然无法在村庄外找到工作,但是他们坚持“农民终生劳动”的观念,不愿轻易放弃工作机会。因此,尽管村庄保洁工作的月收入远低于该行政区最低工资标准(2200元),但对于这些老年村民来说,村庄保洁工作依然是他们唯一稳定的劳动收入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因为家庭而非身体原因选择村庄保洁工作。正如南成村干部在回忆保洁员招募时所说:“男的他不干(这个活),他都出去干(别的)活,再说他也不下力(干这活)。”实际上,案例村庄女性保洁员的总数(31人)是男性(14人)的两倍多,这反映出村庄环卫保洁工作的职业性别水平隔离趋势。男性村民只有在无法找到其他工作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从事村庄保洁工作。而对于70岁以下的女性村民来说,即使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也会因为抚育和照料等家庭原因选择保洁工作。村庄保洁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不会影响她们抚育孙辈的日常劳动,能保证她们兼顾家庭责任与家庭收入。

行村的牛阿姨提到,她之前在一家饭店打工,虽然不耽误接送孙女,但是会占用周末照看孙女的时间。而当村干部询问她是否要做保洁工作时,她表示需要与家人商量。她特意询问了儿媳的意见,在得知“只要不耽误接孩子就行”以后,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此外,由于保洁工作离家近、

易操作,家人有时也可以代为劳动,从而使女性有机会去做更能赚钱的工作或更加紧迫的劳动任务。西成村的隋阿姨提到,她的“掌柜的”(即老伴)做过心脏手术,不能外出务工。但是老伴可以时常代替她完成村庄内的保洁工作,她就有机会到城市里的环卫公司做日工,日工工资(120元/天)远远超过村庄保洁(20元/天)。

总之,不论是为了承担生产性还是照料性责任,在选择是否从事村庄环卫保洁行业时,女性考虑的家庭因素要远远多于男性。这说明在年龄和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女性更有可能选择回村做保洁工作,因此部分地解释了村庄保洁工作中女性为何是大多数。

(二)“他会说我”:乡村环卫保洁工作的性别化分工与女性实践

在风华镇,镇政府制定村庄保洁人员的工资标准和工作要求,村集体则负责人员招聘与管理。虽然没有关于保洁人员性别和分工的明文规定,但是村庄保洁的日常工作却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化分工特征。在乡村环卫队伍中,作为少数的男性往往承担与技术相关的工作(如驾驶、使用以及维护垃圾小车和机械扫保车),作为多数的女性则从事技术需求较低的工作(如使用扫把扫地和收集垃圾、骑三轮车等)。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似乎成为每个村庄聘用保洁人员的一种共识。

大成村妇女主任从性别观念的角度解释这种分工,认为“男的打扫不认真,不如女的扫得认真”。小成村和南成村的书记则认为由于男性村民很少愿意从事这项工作,所以要把男性安排在关键岗位以示重视。另外,许多村干部在访谈中隐晦地表示,电动垃圾小车的驾驶、基础保养和维修都是技术密集型劳动,农村妇女难以胜任。镇政府工作人员则指出,垃圾清运要求垃圾小车在村庄与垃圾中转站之间穿梭,这不仅是体力劳动,而且工作任务和周边环境更加复杂,还有可能要处理突发情况,对驾驶员的体力、安全保障能力和突发情况应对能力等均有较高要求,少有女性能达到标准。

这种性别化的环卫劳动分工从劳动报酬、支配关系和劳动可见性三个层面将女性置于次级地位,亦即职业性别垂直隔离。首先是劳动报酬。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村庄保洁员的标准工资为9000元/年,具体执行标准由村庄自行决定。也就是说,在政策设计层面,“收垃圾”和“扫大街”的工作任务和薪酬标准并无差别。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垃圾收集员(亦即垃圾小车驾驶员)的薪酬普遍高于保洁员。由表1计算可得,保洁员的平均月收入(813元)仅为垃圾收集员平均月收入(1378.75元)的60%。关于驾驶垃圾小车收集、转运垃圾的技术要求更高、工作难度更大的说法为这种薪资差异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支持。在田野调查中,没有任何女性保洁员对薪酬差异表示异议。

其次是支配关系。调查发现,由于垃圾小车的容量更大、速度更快、机械化程度更高,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垃圾收集和转运工作开展的基础和核心。而小车驾驶员因此有机会安排村庄垃圾收集的时间、路线以及各人负责的区域等。由于实际工作中小车驾驶员都是男性,这在无形中赋予了作为垃圾收集员的男性调动、安排乃至支配女性保洁员的权力。

按照风华镇的规划,统一购置垃圾小车的目的是实现垃圾上门收集,那么垃圾小车驾驶员的主要职责就是“收垃圾”。换句话说,“收垃圾”与“扫大街”理论上是分开完成的两项工作任务。田野调查中发现,有3个村庄的确是这种分工模式,但在其余6个村庄中,垃圾收集工作则由驾驶员和保洁员共同参与完成,具体表现为三种情况:在大成村和北成村,女性保洁员紧跟垃圾小车,一路上不断下车捡拾路边的垃圾袋,并投入垃圾小车中;在行村,女性保洁员与垃圾小车分头行动,各自收集范围内的垃圾并运送到中转站;在东成村与南成村,女性保洁员挨家收集垃圾后,运送并投入停在原地的垃圾小车中。

东成村的垃圾收集场景呈现出十分典型的支配关系(见图2)。每日清晨,垃圾收集员路大爷将垃圾小车停在村庄的主路上,由7名女性保洁员分别骑着三轮车沿街收集垃圾,然后投放到垃圾

小车中。当垃圾小车再也装不下任何垃圾时,这些保洁员会骑着载满垃圾的人力三轮车,与驾驶电动垃圾车的路大爷一同运送垃圾前往离村庄不远的垃圾中转站。这个例子生动展现了作为村庄保洁队伍中心的垃圾小车驾驶员如何支配他人展开劳动。更重要的是,以垃圾小车为代表的环卫设备机械化并没有降低女性体力劳动的强度。在这种支配关系中,垃圾收集工作所需的体力劳动被转移给设备更基础、收入更低的女性保洁员们。

不论是往垃圾车中投放垃圾,还是往垃圾中转站里倾倒垃圾,路大爷几乎不必亲自动手……在我看来,路大爷俨然成为“保洁大妈团”的“首领”。他站在一旁,不时和路过的村民聊上几句,只等着阿姨们把自己的三轮车清空,然后转身下令,指挥着阿姨们前往下一个街巷。

《风华镇劳动日记》2023年9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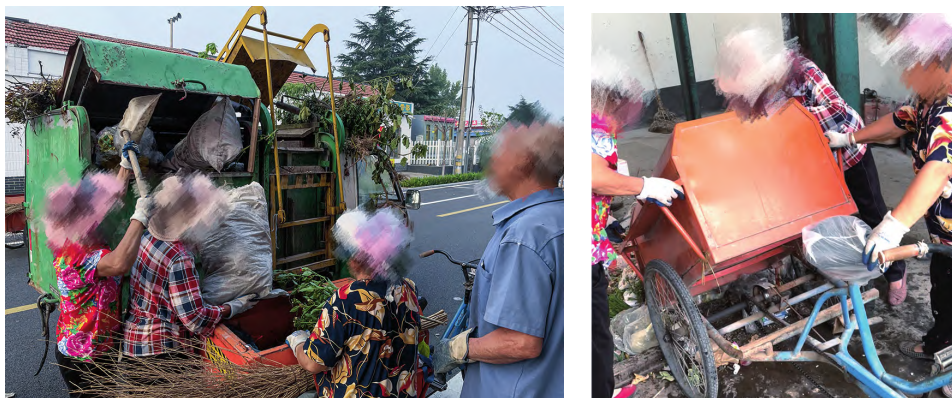


图2 正在收集垃圾(左)和中转站里倾倒垃圾(右)的女性保洁员们

最后是劳动可见性。这里的劳动可见性是指劳动的投入、过程和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被他人察觉和承认。不论是在家庭还是职场,女性及其劳动常常是“隐形的”或“幕后的”,尽管这些劳动对于家庭和社会的运行至关重要^①。在上述劳动支配关系的框架中,为了完成团队分工,女性保洁员通常需要起得更早、工作更久,还要在经济上投入更多。

行村的保洁员牛阿姨和驾驶员何大爷分别收集不同街道的生活垃圾,每人每月的工资均为1330元。牛阿姨负责的片区里有约200户,何大爷负责80户。由于镇上统一为保洁员配置的人力三轮车使用起来比较费力且容量十分有限,牛阿姨自费购入一辆二手电动三轮车,并且把车斗的外沿加高,以运载更多垃圾。除了比何大爷更早开始工作,牛阿姨还必须在孙女起床前赶回家中做早饭并送孙女上学。在一次单独聊天中牛阿姨提到,何大爷有时会检查她清扫过的路面,“扫不好他会说我”(即“批评我”)。在南成村,三位保洁员阿姨也分别自费购入电动三轮车,挨家挨户收集好垃圾后送入停在村委的垃圾小车中(见图3)。而小车驾驶员(吴阿姨的老伴)只需在特定时间段内将垃圾从村庄运送到垃圾中转站即可。

我们知道,环卫设备机械化能够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环卫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但是风华镇的劳动实践却揭示了建立在机械化扫保设备基础上的性别分工与不平等问题。与驾驶垃圾车的男性保洁员相比,女性保洁员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经济与体力投入,但是这些投入通常发生在例行工作时间或者公共生活之外,因此很难被官方或社区同伴认可,更不必说补偿。在机械化与智能化的行业发展背景下,如何调整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与福利在不同性别群体间的不均衡分配,或许对包括环卫行业在内的体力劳动密集型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①宋美杰,幸宇芳:《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2期。



图3 村庄保洁员使用自费购买的电动三轮车收集和运送垃圾

既然农村环卫保洁工作如此辛苦,为何女性依然参与其中?带着这个问题重新观察村庄保洁工作的劳动过程,我们发现,作为保洁员的农村女性不仅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还可以从劳动中获得社会支持。从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角度来看,参与收垃圾、大扫除等环境清洁工作也可能为老年女性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渠道。协作、互助与社交产生的愉悦、归属感和信息交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普遍意义上的“脏活”带来的羞耻和群体性压力,缓解污名化和隐形劳动可能导致的沮丧或焦虑。

西成村的两位女性保洁员不仅在意自己怎么把路面打扫干净,还会主动干预他人行为以维护环境卫生,比如拦截穿过村中的卡车,要求司机给车斗内的秸秆覆盖顶膜以防运输过程中秸秆掉落。虽然东成村的女性保洁员们要承担更多的工作,但是她们也在劳动中攀谈与互助,“阿姨们一直在互相交流,除了相互协调、帮助,她们也会聊谁家丢了一双看起来很新的鞋子、丝瓜怎么炒会更好吃”(《风华镇劳动日记》)。在劳动结束后的焦点小组访谈中,当笔者提起这些互动场景时,阿姨们纷纷表示对这种群体劳作的认可。焦点小组与参与式观察交叉印证了女性保洁员在劳动过程中通过协作、社交和相互支持获得的成就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赵阿姨:“俺(们)就是朋友,比那一家人还团结。”

王阿姨:“这一帮人都很好,有说有笑的。”

赵阿姨:“以前这么大的村,还不大认识。这一干活还都(关系)很好了。”

李阿姨:“不管轻活重活,谁也不分。哪个重活干不了,都上去帮忙。”

王阿姨:“其实这个活干起来还是很好,干个三年五年,心态就很好。”

五、结论与建议

保洁员、清洁工和环卫工人等群体是人与垃圾、垃圾与收运系统、居民与管理者之间的中介,在垃圾治理过程中至关重要^①,但是这样一个关键群体却常常被忽略。通过对18位农村保洁员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农村保洁员具有职业污名内化的倾向,这种自我污名化与保洁员的劳动体验、劳动保障和身体状况相关,具体包括:难以清除身体上的生活垃圾的气味、难以避免与垃圾接触而留下污垢、劳动设备简陋和劳动保护缺乏以及因年龄和健康等导致的有限的工作选择与议价能力。此外,村民选择从事这项劳动的原因和意愿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由于要平衡家庭

^①张劭颖,蒋培:《垃圾分类项目中的关键行动者——一个关于清洁工人的民族志》,《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与工作的关系,更有可能选择村庄保洁工作,即使她们本有机会在村外找到工作。

研究还发现,以垃圾小车为代表的环卫技术应用反映了村庄日常保洁工作中的职业性别隔离问题。作为职业多数群体的女性保洁员几乎全部集中在人力清扫垃圾的工作岗位上。与男性相比,作为保洁员的女性面临着挣得更少、做得更多、劳动更不被看见的三重边缘处境。这种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在多大程度上与垃圾小车的应用有关?意在提高环卫工作效率、保障垃圾日产日清的机械化环卫设备如何能够兼顾效率与性别平等?这些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探究。

研究表明,村庄保洁劳动的社交、合作和公共属性能够促使老年女性保洁员产生成就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保洁工作可能带来的身体压力、收入不稳定和情感伤害。事实上,女性是城乡环卫保洁事业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女性参加村庄环卫工作是农村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妇女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一种途径,有利于构建文明、友善、和谐的社区生活与社会环境。近年来,湖南、云南、浙江等地均出台了保障环卫工人合法权益的有关政策,2023年8月,风华镇所在的区城市管理局成立了全市首家环卫工人权益保障办公室,这说明环卫工人的权益问题已经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根据研究发现,我们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改善乡村保洁工作中的污名化与劳动分工性别化问题,充分发挥妇女在环境保护与卫生事业中的作用。首先,镇政府要进一步优化乡村保洁员的工作环境,提升劳动保障水平,确保乡村保洁员的基本劳动权益(如及时的工资发放和必要的劳动保护与补贴等),从制度设计入手改变乡村保洁员的职业污名。其次,村干部和环卫公司要注意环卫作业机械化转型过程中的性别化分工问题,特别是保障并培育妇女使用机械进行保洁劳动的机会和能力,避免因劳动分工性别化产生对女性的排斥和边缘化。

Exploring the Gendered Work of Village Sanitation and Cleaning

LIU Q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upgrade in 2018, the problems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and long-term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Driven by the policy of urban and rural sanitation integration, the mode of rural household waste management, i.e. "household gathers, village collects, town transfers, and county/city treats",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east China, forming a labor group of rural cleaners.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ed work of rural sanitation and cleaning, especially the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daily cleaning and waste collec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 regular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town that implements the "door-to-door waste collection model"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erforma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gendered work of rural sanitation and clea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sanitation equipment mechanization, and illustrates how elderly female cleaners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work and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ion. By doing so,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sanitation and cleaning personnel and promoting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household waste management;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cleaner; rural women

(责任编辑 李恃帆)